

向晋卫 / 著

思想的  
历史研究

# 白虎通义

人民出版社

# 通白虎

思想的历史研究

向晋卫 / 著

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虎通义》思想的历史研究 / 向晋卫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2 月

ISBN 987-7-01-006069-9

I. 白... II. 向... III. ①经学②白虎通义—研究 IV. B234.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4228 号

## 《白虎通义》思想的历史研究

BAIHUTONGYI SIXIANG DE LISHI YANJIU

---

作 者: 向晋卫

责任编辑: 邵永忠

封面设计: 祁小嘉

版式设计: 陈 岩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87-7-01-006069-9

定 价: 30.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 序

向晋卫博士于1997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大学期间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有浓厚的兴趣。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文献学专业研究生，打下了较好的文献基础，在秦汉史方面用力尤勤。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跟随我攻读中国古代思想史专业博士学位。他对汉代的经学和思想很感兴趣，提出了研究《白虎通义》的想法。这一选题指向过去多被忽略的东汉思想研究，其不避艰难的精神是值得称许的。

涉及两汉经学的学术研究历经千百年的创造、传承、积累，学科基础堪称雄厚，但另一方面，不仅资料的搜集和处理难度越来越大，而且还面临着学派繁杂、争议纷纭等一系列问题，理论难点颇多，出新极其不易。近年来有多种以汉代经学史为主题的论著问世，然而大多以“综合”之功见长，往往未能在细致精确的分析方面提出新的创见。就汉代史的认识而言，近年来物质文化层次的研究多有进展，而精神文化范畴的探索则相对滞后。向晋卫博士所著《〈白虎通义〉思想的历史研究》一书，应当说是有益于改变这种状况的一项成果。

东汉思想没有宏大的理论建构，但却“谨固而笃行”，有着

十分明显的时代特色,《白虎通义》就是其中之代表。向晋卫博士从东汉政治和经学两条线索或两重维度,对《白虎通义》进行了立体式的研究,论及其产生的过程、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社会功能和文化特征等诸多方面,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零碎研究系统化,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充实了汉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在研究中还特别注意了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关系,并由此揭示了经学的政治功能与其学术内涵之间的张力,论述十分深刻,其理论意义超出了《白虎通义》本身,而普遍适用于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有助于校正过去将学术与政治简单等同的“左”的倾向。

向晋卫博士认同陈寅恪“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理念,因而十分重视“详细勾勒还原《白虎通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将《白虎通义》所表达的思想放在整个汉代政治语境中去理解”。书中的第一章“拨开历史的迷雾——对东汉光武、明、章时代的反思”就比较深入而准确地描述了东汉初年的社会政治形势,《白虎通义》成书的历史背景因此得以明朗。

《白虎通义》一书的政治文化色彩是相当浓厚的,向晋卫博士在书中没有沿循以往政治哲学分析或政治神学分析的单一思路考察该书的文化价值,而是重点揭示了其中体现的儒学学者的政治理想。作者将儒家政治思想的有机整体概括为“正名”、“制礼”和“教化”三个步骤和组成部分,并按照这一逻辑顺序,从“拨乱反正”、“制礼作乐”和“礼乐教化”三个方面对《白虎通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有助于读者增强对《白虎通义》一书的立体认识。

全书对于《白虎通义》思想体系的研究是准确而到位的,

但是，说到对《白虎通义》思想进行“历史的研究”，在此书许多思想的渊源分析方面尚有加强的余地。固然，《白虎通义》一书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若对于其所有内容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详细分析研究，也非一本书的容量所能包容，建议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适当补充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向晋卫博士笃志好学，史学功底扎实。在认真研究《白虎通义》原著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依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希望他今后在学术领域尤其是秦汉史研究方面继续努力，辛勤耕耘，做出更大的成绩。

周桂钊

2006年9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 引 言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东汉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显得十分薄弱，除了对桓潭、王充、王符和何休等少数几人的研究比较充分之外，其他方面的成果则一概阙如。<sup>①</sup>虽然近年来这一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例如对于东汉之显学“谶纬”以及东汉经学都加大了研究的力度，但是，对于东汉思想的重视程度仍然不是很高，而这样的状况是与学者对东汉思想的总体评价相吻合的。蒙文通先生曾说：“东京之学不为放言高论，谨固之风起而恢宏之致衰，士趋于笃行而减于精思理想，党锢君子之行，斯其著者，而说经之家固其次也，故董、贾之书犹近孟、荀之迹，而东汉之学顿与晚周异术。”<sup>②</sup>的确，相比于西汉初年的“子学”风气甚至西汉中后期的“杂王霸”来说，东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对思想的正统性也更加重视，这只要比较一下同样是史学家的司马迁及其《史记》与班固及其《汉书》的风格即可明白。失去了“子学”特色的东汉学术思想界在“精思理想”方面无疑无法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但其在“谨固之风”方面则毫不逊色，并且在“笃行”方面也相当突出，在此，蒙先生可以说是触及了东汉思想的关键处，即“笃行”确实可以说是东汉社会的整体特征。在笃行方面，不仅东汉末年“党锢

君子”的所言所行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真精神，而且整个社会在儒家思想的普及上也有了极大提高，“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sup>③</sup>而正是由于儒家思想与汉代社会的这种紧密结合，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才得以真正发挥，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弊端和不适逐渐显现和暴露的过程；与此相应，东汉的经学也颇具“笃行”的特征，东汉的经学少了许多西汉“董仲舒式”的宏大理论建构，却增加了更多的可操作成分，以便使经学能够真正发挥其“规范”社会的现实作用，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经学与现实王权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汉儒隐秘的现实关怀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此，研究东汉经学就成为把握和认识东汉思想世界及其特色的主要途径，而在这一方面《白虎通义》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具体到对《白虎通义》的研究，虽然研究者对其在东汉甚至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都持十分肯定的态度，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看法上却众说纷纭。比如在《白虎通义》的思想特点及其历史意义上，目前学术界就有三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侯外庐先生认为《白虎通义》是庸俗经学与神学的混合物，是东汉国家的“封建法典”；任继愈先生也认为它是一种制度化了的思想，起着“法典”的作用；余敦康先生更是认为：“如果说武帝时期是把经学建立为统治思想的开始，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则标志着建立的完成。……从这个意义来看，白虎观会议是两汉经学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sup>④</sup>而金春峰先生则认为《白虎通义》一书“汇集四十三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重要条目并不是关于制度的法典式的规定，而是汇集不同观点的学术说明和解

释。”“虽然由于皇帝亲临裁决而使这部名词汇编具有官方经学和权威法典的性质。但它还是以学术形式出现的，它的学术性质是占主导地位的。谶纬的神学方面受到了抵制和极大削弱。”<sup>⑤</sup>刘泽华先生更是认为《白虎通义》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虽具有学术性，综述了不同的观点，但基本上仍是一个政治文献。……在实际政治中，《白虎通义》虽说不上是必须遵守的‘国宪’，不过在思想观念上确实有相当的权威性。”<sup>⑥</sup>在此，研究者相互之间的视角分歧是十分明显的，有的认为其主要功能体现在政治方面，发挥着政治法典的作用；有的则更为看重其学术方面的意义；有的则认为政治与学术方面的意义兼而有之。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无疑有着主观和客观上的双重原因，客观上讲，作为研究对象的白虎观会议及《白虎通义》本身即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因而无法轻易断定其具体的学术意义和历史意义；主观方面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视角不能很好地适应研究对象，因此，要想真正解决认识上的这一分歧并进一步把握《白虎通义》的历史意义及其思想史内涵，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些争论上，而是有赖于对《白虎通义》本身以及当时社会的充分认识和准确了解，而这正是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

采用什么样的视角剖析《白虎通义》，以便既能够与研究对象契合，又能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发掘其历史意义是本节所要说明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基于《白虎通义》本身“亦政治亦学术”的特点，本书将从整体上将其放在汉代“政治”与“学术”的相互关系之中去分析，在汉代政治、儒生和学术（经学）三方所构成的政治社会格局中去认识其真正的时代特色和思想意义。具体说来，本书的研究主要贯彻了以下几点：

1. 以发展的和运动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任何思想史上的事件或学派其本身都处在一个不断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之中，因此，在研究时就不能孤立地片面地下结论，而应该首先弄清楚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概况及其前因后果，这样思路才能更加开阔，分析才能更加合理和深入，概括也才能更加全面。例如对于白虎观会议以及《白虎通义》的历史意义历来评价都比较高，多数学者甚至将白虎观会议视作儒家思想和汉代经学在汉代确立其统治地位的最终“完成”。在此，所谓“完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白虎通义》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认识上，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儒家思想及其经学与汉代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因为无论是从儒家思想及其经学内容本身还是从汉代政治的现实来说都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固定和停滞不动的，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因此，与其在对儒家思想及其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做大而无当的宏观判断，倒不如在对整个传统社会以及传统经学发展过程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在微观层面上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出详细而周密的分析。

2. 从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加深对《白虎通义》的认识。“外缘影响”与“内在理路”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历来众说纷纭，与此相应，在“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也见仁见智，到底是社会发展促生了思想，还是思想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或者是互相推动，至今也没有定论，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研究客体”的本身性质所致，因为思想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复杂关系，二者之间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表现形态和发展演变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为在皇帝亲自主持下召开的经学会议，白虎观会议

就不仅仅是为着经学内部的问题；同时，“汉儒”在会议上讨论学术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在“学术”上面，而必定有着相当强烈的现实关怀，因此，如何在研究《白虎通义》文本的同时，凸显“汉儒”的现实关怀就成为本书力图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3. 贯彻“知人论世”的写作方法。研究《白虎通义》不能采取狭隘的“对号入座”的方法，从中截取一两句话就说它代表了什么阶级，或者仅仅从一个单一的角度对其加以片面化的解释，而必须从当时的时代氛围及其思想水平出发，既不要抬高也不要贬低，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以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sup>①</sup>

首先，要抓住汉儒最为关心和最想解决的“问题”，即当时人和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只有明白了他们的“时代话题”，研究工作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于汉儒来讲，其内心的焦虑主要是一种“制度性焦虑”，即对于客观政教制度的渴望。如果将历史上的儒家分为“内圣”和“外王”两派的话，汉儒就

正处在强调“外王”的一端，也就是说汉儒相对来讲更强调和注重思想的“经世致用”，而较少做“形而上”的玄想，“秦汉之时，学者言性之思路与先秦学者不同，在其渐趋向于为成就客观政教之目的而言性，而不同于先秦学者之多为成就人之德性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而言性”。<sup>⑧</sup>因此，从总体上来讲，两汉时期在思想上并不是一个创造力特别旺盛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思想的社会化时期，创造的时代需要思想的火花，实践的时代则需要更多脚踏实地的工作，而这正是《白虎通义》的规范性意义之所在。

其次，在研究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思想时，总会遇到一些特殊的矛盾现象，例如有相当部分的汉儒既有很明显的“天人感应”思想，又有明显的人文主义的倾向，甚至否定“天人感应”的言论，对此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呢？也许有人会这样来解决问题：人的思想往往是十分复杂的，本身就会有矛盾的地方，同时也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确是事实，但是，我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与研究对象的“异质化”，即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所运用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相对于研究对象来说并不是适合的。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问题，也有不同的思维习惯和解决方法，因此，我们今天看来十分矛盾的东西和现象对于古人来讲也许是很正常的，而对于我们来说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古人看来则会成为“怪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力从古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古人的“问题”就成为解决问题或接近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再次，在思想史的研究上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假相所迷惑，因为自己所接受的知识有很多是经过许多怀着不同目的的作者或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造作出来的，因此，在历史研

究尤其是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千万要注意不要被前人的主见和说法所迷惑，要透过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意见”，透视其背后的真实历史。

4. 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由于“白虎观会议表面上看来是为经说的统一而召开的，实际上，礼制人伦的制定才是最主要的目的。因为面对着大一统的帝国，在皇权专制之下，要建立人与人的合理关系，使每个人能过着有秩序而和谐的生活，只有集结整理儒家礼制的思想，以发挥各自的根据及教化的手段和目标”，<sup>⑨</sup>所以，《白虎通义》通过对一系列“礼制”条文的解释和规定事实上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框架和制度体系，因此，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将按照儒家思想“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的顺序对其展开论述。同时，为了增强论述的真实性和历史感，在构建《白虎通义》思想理论体系时也尽量使用了传统社会原有的一些政治术语。

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重点着眼于透视东汉初年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并通过对两汉之际社会变迁过程的深度分析，明确白虎观会议召开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二章，分析白虎观会议召开的主要原因以及汉章帝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对《白虎通义》的研究状况和整理过程作了详细的回顾；第三章，重点对《白虎通义》的学术性质即在经学上的主要学术特色和历史意义作了详尽的分析；第四章，从“拨乱反正”的角度分析《白虎通义》在东汉初年思想秩序混乱之时所发挥的“正名”作用，以凸显《白虎通义》在为当时的统治秩序寻找和论证合法性、确立统治阶层的历史地位和恢复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五章，从西汉以来在“制礼作乐”活动中的斗争与争论出发，引出东汉初年在“制礼作乐”方面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进而分析《白虎通义》在“礼制”上的主要内容及其原则，尤其是对其中的“君臣礼制”作了重点论述，以加深对汉儒政治理想的认识；第六章，从“礼乐教化”的角度分析《白虎通义》在儒家思想社会化方面的主要设想及其实施途径，同时，对东汉时期实施“名教”之下的社会弊端也作了详细论述，以此凸显儒家思想在社会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汉末儒家思想出现危机的内在原因；最后结语一章，从理论层次上对“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在汉代四百多年的具体表现作了一番总体概述，希望能在对汉代社会政治与学术相互关系有所把握的基础上对《白虎通义》也能有一个更深度的认识。

5.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对儒家思想的理论及其社会实践作了重点的分析。具体来讲，在文中除了按照儒家思想的逻辑顺序安排基本的章节之外，还同时将儒家思想在两汉四百年中社会地位的升降作为另一主线，通过对儒家思想地位的上升、固定到最终僵化的历史过程的深度分析，彰显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及其主要弊端。

以上几点就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注意的几个问题，同时，也基本上构成了本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即通过将《白虎通义》与当时社会背景以及整个儒家思想传统的互相比对，真正把握汉儒的所思所想以及整个儒家思想的基本理路和历史功过。

最后，在材料的运用上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由于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详细勾勒还原《白虎通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因此，在材料的运用上除了以《白虎通义》为基本依托兼及其他经学材料外，也大量地参考了汉代的其他历史资料，以便将《白虎通义》所表达的思想放在整个汉代政治语境中去理解；其

二，由于《白虎通义》是当时的经学家就一条一条具体的“礼制”所做的讨论，并没有有意识地去建构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只是在对经学的解释过程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则为其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政治思想框架，以凸显“汉儒”以至整个儒家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信念，因此，在论述的过程中就不免有重复使用同一条资料的地方；其三，在对一些具体材料的处理上也比较灵活，没有拘泥于具体史料的时间和地点，而主要关注和挖掘的是特定史料所具有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

## 注 释

- ① 例如周天游先生就曾指出过：“在秦汉史研究中，东汉史始终是个薄弱环节。虽屡经呼吁，仍起色不大。这不利于秦汉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应尽快予以改变。”（周天游：《秦汉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4页。）
- ② 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
- ③ 《后汉书·儒林传》。
- ④ 余敦康：《两汉时期的经学和白虎观会议》，《中国哲学》，第十二辑，人民出版社。
- ⑤ 金春峰：《两汉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89—491页。
- ⑥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7页。
- ⑦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
- ⑧ 唐君毅：《原性篇》，《唐君毅先生全集》之《中国哲学原论》，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89页。
- ⑨ 林丽雪：《〈白虎通〉“三纲说”与儒家之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 目 录

|                           |      |
|---------------------------|------|
| 序.....                    | (1)  |
| 引言.....                   | (1)  |
| <br>第一章 拨开历史的迷雾           |      |
| ——对东汉光武、明、章时代的反思 .....    | (1)  |
| 第二章 《白虎通义》的形成、流传与研究 ..... | (22) |
| 第一节 汉章帝与白虎观会议的召开 .....    | (22) |
| 一、白虎观会议的学术背景 .....        | (24) |
| 二、白虎观会议的政治背景 .....        | (28) |
| 第二节 《白虎通义》的流传与研究 .....    | (34) |
| 一、《白虎通义》的流传 .....         | (34) |
| 二、《白虎通义》的整理和研究 .....      | (36) |
| 三、《白虎通义》的研究现状 .....       | (51) |
| 第三章 《白虎通义》与汉代经学 .....     | (57) |
| 一、《白虎通义》的经学观 .....        | (57) |
| 二、《白虎通义》在内容上的特色 .....     | (59) |
| 三、《白虎通义》在形式上的特色 .....     | (66) |
| 四、《白虎通义》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    | (67) |
| 第四章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名 .....    | (80) |
| 第一节 何谓“正名”? .....         | (80) |

|                    |       |
|--------------------|-------|
| 第二节 究天人之际          |       |
| ——《白虎通义》中的“天人关系”   | (87)  |
| 一、《白虎通义》中的“天”      | (87)  |
| 二、《白虎通义》中的“天人关系”   | (91)  |
| 第三节 通古今之变          |       |
| ——《白虎通义》中的历史哲学     | (102) |
| 一、汉代历史哲学发达之原因      | (102) |
| 二、《白虎通义》历史哲学分析     | (105) |
| 第四节 重道德之义          |       |
| ——《白虎通义》中的道德意识     | (117) |
| 一、“名号”的道德意蕴        | (118) |
| 二、“器物”的道德意蕴        | (123) |
| 三、《白虎通义》的解经方法      | (128) |
| 第五章 礼乐制度的重建——制礼作乐  | (139) |
| 第一节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 (139) |
| 一、汉儒“制礼”的追求和实践     | (140) |
| 二、汉儒“制礼”的政治文化意蕴    | (147) |
| 第二节 《白虎通义》的礼制内容    | (151) |
| 一、关于“制礼作乐”         | (152) |
| 二、《白虎通义》的礼制内容      | (155) |
| 第三节 《白虎通义》的君臣之礼    | (171) |
| 一、关于“君”礼           | (171) |
| 二、关于“臣”礼           | (180) |
| 三、君臣关系             | (186) |
| 第六章 儒家思想的社会化——礼乐教化 | (197) |
| 第一节 儒家的礼乐教化观       | (197) |
| 一、礼乐教化何以可能         | (199) |
| 二、礼乐教化何以必要         | (202) |
| 三、礼乐教化的目的          | (205) |